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五一六期 ——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7f)

---

- 【研究报告】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 “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  
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李 逊
- 【文献资料】 陈伯达、江青、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07.26)
- 【史海钩沉】 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莽东鸿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研究报告】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 “文革”中上海“工人造反派”及工人阶级的地位

• 李 逊 •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 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 工人不但是老大哥, 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1949年以后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 而到了文革时期, 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 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与今天工人的地位相比, 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 所谓工人阶级, 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 被称作“产业工人”; 集体所有制的工人, 户口在城市者, 也被划作工人阶级, 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农民。直至今日, 户口在农村者, 哪怕在城市工厂工作了十年, 也还是被排斥在工人队伍之外, 被称作“农民工”。而“工人阶级”的外延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始终游移不定。有时似乎是全体工薪阶层, 包括现在被称为“白领”的阶层, 有时白领阶层又被分了出去。不过, 不管如何划分, 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 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 “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1〕。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2〕；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3〕。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4〕。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

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无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搞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5〕。

不过，这一切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尽管在基层，参政的工人干部确实拥有比文革前大得多的权力，但在权力机构的上层，工人并没有多少话语权。文革的话语权一如文革前，只在毛泽东手中。毛泽东一言九鼎，一句话决定整个中国命运，没有任何个人和阶层有这样的强势。其实，以江青、张春桥为首的文革派，也并不握有全部的话语权，他们所握有的只是阐释毛泽东的主意或思想的话语权。毛将执行政策的话语权交给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干部阶层，在文革前，诤注和执行权都集中在干部阶层手中，但后来毛越来越不满于干部阶层对自己的阐释，将阐释权转交张春桥等人，由此发动了文革。

制定政策方向的权力，始终只在毛泽东自己手中。这是毛的三权分立：自己制定政策方向，文革派阐释政策，干部执行政策。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6〕。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斯利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坚决拥护”。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文革十年，看不到由工人造反派提出的为工人说话或谋利的提议或政策。这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普通工人。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帮派意识，而不是所谓的阶级意识。虽然这一切的背后，可能是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明确意识到的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 二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派。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派。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后，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

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6〕。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7〕。

其三是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

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7〕。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9〕。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10〕；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 三

自从1949年以来，宪法保护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从来没有全部兑现。只有在文革发动群众时期，即1966年至1968年，话语权才有所保留地释放。从文革初期的1966年12月起，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便有着自己的机关报《工人造反报》，刚开始时发行时只有3万份，以后发行量不断增加，最多时64万份，增刊最多时为105万份，超过当时上海党报《解放日报》的发行量。《工人造反报》上的许多文章，是当时上海基层必须学习的政治读物。更有不少文章被中共机关刊物《人民日报》或《红旗》杂志转载。外省市造反派将《工人造反报》上的文章作为中央报刊的补充读物，以“学习上海经验”，揣摩中央文革“最新精神”〔11〕。

但是这样的好景不长，不到两年，1969年后，有限度的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被完全收回，全国各地的小报、传单相继停刊，舆论重又归于一律。唯独上海《工人造反报》继续出版发行，外地对此意见很大，张春桥于是多次指示停刊。王洪文一拖再拖，希望能保留这个舆论窗口。直到1971年4月，才不得不停刊。

1968年，工总司打报告给张春桥，要求创办综合性的月刊《上海工人》，但张春桥未同意，说工人造反派有一份《工人造反报》就够了。

《工人造反报》停刊后，总工会先后办过几份“内部刊物”：《简报增刊》、《批林批孔动态》、《内参》，等等。但毕竟都只是“内部刊物”，发行范围极小，只送王洪文等人，毫无社会影响。1975年王洪文回上海时，要求总工会办刊物。叶昌明即布置准备办两个刊物：《工人理论》与《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由上海工人政治学校与市总工会宣教组合办，以上海工人政治学

校的名义出版〔12〕。

但是，总工会办自己刊物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先于《工人理论》出版的《上海工人文艺作品汇编》第一期被徐景贤看到，徐立即交张春桥的秘书转给在北京的张春桥。张阅后立即批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能随便出刊物。”王洪文只得逼着总工会的叶昌明等人作检讨，并停了刊物〔13〕。

上海工人造反派希望能依托自己的刊物提高政策影响力，但根本不被允许。工人作为一种象征被抬得高高，但却进不了主流话语圈，尽管报纸上一再宣扬工人阶级的崇高地位。文革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手里，在中央，舆论都由张春桥、姚文元等掌管，上海的舆论则由徐景贤掌管。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连注释权都没有，有的只是重复那些注释，或阐释那些阐释。王洪文虽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及上海市委副书记，但根本无法影响中央的报刊，连上海的报刊都影响不了，显示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口号下的某种真实。

#### 四

文革中利益分配是倾斜于整个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虽然在经济领域没有出台明显面向他们的优惠政策，但工人阶级得到的政治资源却是最多的，这大大提升了工人的实际地位，加上工人职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工人令人羡慕的稳定工作和良好福利，使工人成为最令人向往的职业。虽然知识含量高的其他职业的经济收入和福利待遇不比工人差多少，而且文革前更受社会实际尊重，但对知识的贬低和对干部的冲击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这些职业不成首选。许多大中学毕业生以及军队复员转业人员，青睐的是国营工厂，而不是如今热门的工商、税务、银行等职务。

工人所得到的政治资源很多可以转化为经济利益。例如学生的毕业分配，或是已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的上调回城，或是被推荐参军上大学，工人子女比其他阶层子女有着更大的优势，出身就是他们的政治资源。当然，同样有着优势的还有“贫下中农子女”和“革命干部子女”。但“贫下中农子女”因受户口限制，在招工上调等方面敌不过工人子女；“革命干部子女”中相当一部分父母成了走资派，在一个时期失去特权。此外，在福利分房、工资奖金分配、干部提拔等方面，工人阶级得到的实惠都是最多的。

这种状况甚至影响了社会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文革中对人的尊称是“师傅”，这个原来在工厂内对有一定资历工人的尊称，随着工宣队进驻各领域而流行，一度代替了“同志”；报纸为显示革命性争相使用工人的日常语言；工作服成为继军装后的流行服饰。此外，在老百姓中，和工人结婚是婚嫁的首选。

#### 结论

文革中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的地位是共产党执政以来最高的，与今天他们一落千丈的地位对比更显出强烈落差。但是这种优势十分脆弱。因为优势的根源不是这些工人本身的素质，只是计划经济下的被动给予。工人的劳动价格与实际价值不对称，不是通过市场流通自然形成，而是被人为拔高。而且，文革中的社会机制与文革前在本质上没有丝毫不同，根本没有提供一个让各个利益集团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民主协商机制，工人造反派除了为自己在这个机制中争取更多席位，没有想到也不可能被允许对这个机制进行改革。于是一旦整个社会运作由阶级斗争逐步让位于经济规律，工人没有可以依托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操作平台。如今，官办工会在咄咄逼人的资本面前显得那样软弱，在更强势的外资企业，甚至连官办工会都无法组建。

“工人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本质上是与“阶级斗争为纲”相副相成的。1949年以后人为宣传“工人阶级”，执政党取得执政合法性以维持“专政”的需要，也是历次政治运动不断打击反对势力或“人造”反对势力的需要。并非真正看得起工人。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各个社会成员和阶层都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领导阶级”而高于其他阶层，更不应该有哪个阶层是被打击对象。

社会的价值取向永远是势利的。在告别了阶级斗争后，经济收入成为社会地位的判断标志。国家在经济利益分配中所起作用越来越小，原先依倚仗自己是国家企业职工而被钦定为领导阶级的全民所有制工人，因经济收入的降低以及就业的不稳定性，越来越被边缘化。昔日的大哥，如今成为弱势群体的代名词。

工人造反派是工人的组成部分，尽管他们具有很强的帮派意识，但他们也具有很强的阶级认同感。在党和政府同时又是企业所有者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文革中的社会冲突主要只能表现在政治上而不在经济上，工人造反派的参政因此并没有为工人带来太多的实际利益。他们所起的作用更多是在民主权益的争取上。工人造反派的存在，以及他们对“规章制度”、“管卡压”、“走资派”等的不断批判，使干部对工人的管理比文革前松动许多。这种松动，有规章制度松懈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干部权威的下降。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自由度以及与管理他们干部的关系是1949年后最高最松弛的，这种松弛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再没能恢复到文革前的程度。文革时期是最让工人具有“主人翁”感觉，也是工人整体阶级意识最强的时期。但是，由于许多工人造反派文革前和初期形象不佳，加上他们一旦掌权，关心的只是自己帮派的利益而不是整体工人的实际利益，使得普通工人对他们缺乏认同感，换句话说，广大工人并不将他们作为代言人，他们也从未真正为工人代言，这是工人造反派的悲哀。

上海工人造反派与党的关系文革后被批判为“派性”，“工会凌驾于党之上”。其实，工人造反派的这种派性实际是对自己利益集团的参政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具有民主成分。作为一个政权结构，本来就应该是各种利益集团的协商和互动。但当时执政党认为自己已经代表了所有阶层和集团的利益，不需要，也不允许任何利益集团出头为自己争取利益。文革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利益尚未分化，在别的阶级或阶层都没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的情况下，工人造反派面对的不是其他利益团体，而是整个政权；加上没有制度层面的相关机制，于是显得非常孤单和突兀，也引起普遍反感。

工会的地位是工人地位的反映。文革中的工会地位虽然高，但仍然是虚假的。虽然这个时期的工会比任何时候都独立而有自主意识，但工会的权利不是来自宪法的“自由结社”，工会仍然依附于党。只不过文革前的工会是依附于整个党，文革中则依附于党中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势力大一些，工会的力量就强一些。工人不能通过自由结社选择当政者。而且工会的这种相对独立现象只在上海等少数地区才有，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地位也就不是上海工人的地位，更不是全国工人的地位。文革的经济体制毕竟仍与文革前一脉相承，党和政府仍是企业所有者，对企业不满就是对党对政府的不满，工会的真正独立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掌握着工会的上海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最根本原因。

毛泽东真心将整个工人阶级视作精英阶级、将工人造反派看作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这从他的一系列讲话中，以及提拔王洪文当接班人等做法中能够看出。但是工人造反派自身的政治素质使他们担当不了毛的重望，“直升飞机”式的被提拔，使得他们缺少从政经验。他们在所受教育程度上比不过文革派中的文人班子，在政治经验上比不过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他们许多人身上所具有的江湖气、流氓气和帮派气，甚至使得文革派张春桥等也对他们存有戒心，这是工人造反派的又一悲哀。



注释：

- (1) 《上海市组织史》1991年征求意见稿(打字本)，上海组织史编纂组编
- (2) 徐景贤1970年11月24日与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的谈话记录
- (3) 根据《经中央批准的中共上海市第四届委员会名单》1971年1月13日中共上海市委文件沪[71]号统计
- (4) 上海市总工会组织组1974年4—5月间的统计：《全市工宣队情况》
- (5) 上海市公检法《关于培养“工人大使”、“组阁”是否列入起诉书的几种意见》
- (6) 上海市工代会1972年《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新干部队伍和工代会的建设》(讨论稿)
- (7) 叶昌明1977年6月14日
- (8) 叶昌明1977年4月5日：《交待关于利用总工会结帮的问题》
- (9) 金祖敏1974年《关于选拔培养新干部和发展新党员的情况》，转引自中共上海组织部1976年12月14日整理：《四人帮在上海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言行初编》
- (10) 王秀珍1976年11月25日
- (11)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工人造反报〉调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 (12) 上海市总工会“清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运动领导小组”：《关于王秀珍、叶昌明利用工人理论队伍进行篡党夺权罪恶活动的清查情况》，1978年1月25日。
- (13) 王秀珍1977年

参考文献：

- 《参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体与文革期间社会矛盾的展开线索》，作者老田，转引自《多维博客》2003年7月
- 《谈谈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的政治落差》，作者老田 2004年9月(在网上读到的，但是哪个网站，没记录)
- 《中国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作者杨小凯，转引自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4年第227期
- 《文革中的领导与群众：话语、冲突和集体行动》，作者萧喜东，转引自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2年第137、138期
- 《文化革命中造反运动及造反派之评析——为文革三十五周年而作》，作者刘国凯，网络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2003年第165、166期
- 《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文革史研究之三》，作者陈益南，转引自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络文库2004年6月
- 《政治迫害与造反运动》，作者华林山，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8月号
- 《痞子与红卫兵：工厂造反派的两种类型》，作者萧功秦，网络《天涯社区》萧功秦专栏

~~~~~

# 【文献资料】

陈伯达、江青、康生在北京大学的讲话  
(1966.07.26)

〔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李雪峰。会前陆平、彭佩云游台几次。〕

## 江青同志讲话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

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组长王任重同志，副组长刘志坚同志，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同学发言略）

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北大同志发言，略）

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时已二十三点十分）我讲几点事实好比好？（答：好）

江青：同志们写条子叫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叫他们听着。

刘昆林（法律系）发言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因激动没讲完）。

刘青华（技术物理122）发言《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钱》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对他的迫害。

康生：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话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话，放在下面好不好？（好！）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于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五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孔立明：（工作组组员、秘书处）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

江青：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康生：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耿佩荣（东语系越四）发言揭发工作组在“六·一八”问题上对她极为错误的处理。结论是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讲完时，台上首长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宋晓明（西语系法一，《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我说错了他，他要是革命家，决不会躺倒不干，如果他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那我就骂对了。

申叔南：（生物系一年级）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崔建昆：（地球物理系二年级）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批驳。坐下学文件必要。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牛忠林（法律系）发言反对上述意见，（指申、崔）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结论是：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读《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

江青：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不同意）

李扬扬：（文五、四）代表贺晓明等31名革命干部子女讲话，全面评价工作组。1.反对说成是路线性错误，是严重的右倾思想。2.功与过，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够，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3.“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在权夺得好。4.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关于‘六·一八’是群众自发的革命运动”。5.“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6.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江青：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好！）

石小阳：（物理系）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康生：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江青：我每次来，你们写条子，意见书，他（指毛主席）都一件件地看了（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我们认为正确的就鼓掌，不正确的就不鼓掌。）

郭来舜（东语日二）发言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发起人之一）发言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彭小蒙讲完后台上热烈鼓掌，彭要走下台，江青同志又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继之热烈拥抱亲吻。然后又与诸领导人一一握手）。

哲二代表董小结：提两个建议。1.保留工作组；2.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江青：今天发言到此为止，因为我们工作小组也在日以继夜地工作，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场上群众激动不已）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来讲一些事实。关于“六·一八”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场上再度沸腾）我到北大有四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没见过。他不见我们，刚才他写了封信给我，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五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指生病的孩子——笔者）结婚！（气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历史系）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江青同志的女儿，原我校历史系学生——笔者）给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

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要不要我说一说（要！）那天谈话的五位同志贺晓明、雷于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四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她很激动，讲不下去了）

陈伯达同志讲话

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今天会上听到了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很激烈，很尖锐，这是种正常的现象，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撤掉这个障碍物。这里好象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可以不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我们有许多人还受到旧社会的影响，受了旧社会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影响，好像革命当然要有一个工作组，没有工作组就革不下去。要破坏这种旧的习惯势力。

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重复毛主席经常说过的一句话“破除迷信，破除习惯势力”。那你们怎么办呢？有没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呢？（答：有）任何革命都不能包办代替的，都不能由外来的力量包办代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象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样看看有没有把握把你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我想你们一定能搞好的。你们在选举时要注意有广泛的代表性，要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教师职工中应该有他们的代表。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这两个建议如果你们赞成的话，那么你们可以考虑，有许多具体问题，要看档案，电台，武装的一切管理制度，这方面的人在没有改选以前，要负责到底，要受群众监督，其中有打问号的人，也可以提出来，请文革委员会考虑。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之后，是不是你们就没有饭吃？要学会管理生活，现在管理你们自己伙食，行政事务工作的，还是不动，希望他们还是做好，以后要做得更好，将来文革委员会成立以后，可以考虑成立生活管理委员会或者小组，他们不是代替，而是监督。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

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六·一八”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六·一八”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同志讲话

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第一个问题，“六·一八”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么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有的为张承先工作组定调子。张承先到北大五十多天来，没有真正教育同志，使同志们认识到北大的文化革命要由北大的革命师生来搞，他们没有进行教育，这一点是很大的错误。这一点，就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第二个，五十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么说的？要靠自己救自己！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不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因此，同志们，你们组织文化革命委员会时，必须紧紧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个红旗，相信自己，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我们的一切事业就会前进，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好在哪里？好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联系群众，团结群众。离开群众就不是好的，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斯大林讲过，群众是我们的母亲。毛主席讲，群众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希望党员，团员，革命干部子弟必须掌握住放手发动群众，必须掌握好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把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志们，我们讲依靠你们，依靠革命委员会。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么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领导。

再一次重申一下，这是一个建议，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讲，还可以千言万语地讲，你们可以百花齐放嘛！真理越辩越清楚，经过辩论达到万众一心，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的万众一心。

同志们，你们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也好，你们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呢？我们提一个建议，请你们读一读毛主席的接班人的五条。这五条，它不仅是接班人的五条，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那里讲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掌握毛泽东思想；那里讲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不能自私自利为资产阶级服务；那里讲要团结大多数，不仅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还要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甚至反对过自己并且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那里讲要执行民主集中制，实行民主；那里讲要有批评，自我批评的精神。这一切都是你们今后工作的最重要的指针。我相信你们会在党的领导下，在新方针的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彻底胜利，关键在于你们自己和能否把真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北大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了解，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工作组、张承先了解呢？陆平、彭佩云所材料是你们揭发呢，还是靠张承先几个人整理材料呢？

五十多天以来，没有广泛地发动你们揭发，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怎样斗陆平、彭佩云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翦伯赞、冯定的情况是你们了解呢，还是张承先了解呢？是你们看的翦伯赞的书多呢？还是张承先看得多呢？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么样？课程怎么样？专业怎么样？教科书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么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说嘛，我们不怕！）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应该！）这叫什么“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另一张条子问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利用一张大字报镇压左派，镇压革命的事。也是六月二十日，师大的王运良同学贴了一张大字报说彭真要在北大、人大驻军，问郭影秋晓得不？题目是《郭影秋是什么人？》，孙立刻作了报告，有四十个字说这个同学煽动人民和解放军的关系，对这个同学进行打击。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我说过在北大，人大驻军，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是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这件事调查的结果军委晓得，华北局晓得，不一定是彭真搞的。决不否认以下两件事：

一、彭真是否要搞政变呢？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是要搞政变的。中央文件上说彭真是修正主义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在时机成熟时就要搞反革命政变，搞反革命复辟的。至于什么时候搞，我不知道，只是说是时机成熟时搞，没有说今年二月搞。二、彭真是否要夺军权？搞政变不抓军权不行，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彭真勾结×××就是要抓军权……，因此，我们答复这个问题：1，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什么时候？还不知道。2，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已经和×××勾结起来。在北大、人大是否要驻军？军委、军区知道，现在还没有调查清楚，不知道是否要搞政变。孙友渔利用这张大字报镇压革命，同学们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孙友渔要利用这个来围攻同学呢？这件事有，我没有说二月兵变，看来彭真二月兵变还没有准备好。

再有，同志们问我，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是不是要建立组织？我很理解同志们的心情，要在北大贯彻阶级路线，这种心情是好的，是要贯彻阶级路线。过去陆平黑帮反对阶级路线。第一，我很理解同志，们在陆平黑帮统治下受迫害，受打击，现在明白了要团结起来，不再受政治上的打击，这种心情完全是对的，我完全理解。第二，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革命的左派队伍如何实行阶级路线，许多学校还不清楚。学校里是否有阶级组织呢？有！是共产党，是共青团。共产党你能说不是阶级的组织？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共青团也不是资本主义青年团嘛。问题在于前市委统治下，党团组织有很多问题，北大校党委，团委，都瘫痪了，但不能因为瘫痪了，就要另建阶级组织，我们的任务是彻底改造这个党团组织。是否需要再建立一个阶级组织呢？江青同志已经说过阶级队伍要通过党团组织来表现，不需另搞一套了，而且那样会被孤立起来的，使团结受到损害。真正革命的工人，农民，干部子女怎么办？我建议好好学习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条。第一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要成为一个很好的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党团员，好统治。第二条是能真正地全心全意为中国，世界大多数人服务，离开了绝大多数人，就不能叫真正的革命者。第三条，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子弟，要注意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团结他们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向彭真式的人物，向陆平、彭佩云黑帮作斗争。左派工人、贫下中农，特别是革命干部子弟要警惕，时时刻刻不要脱离群众。毛主席在给清华红卫兵的信里就讲到这个问题，要团结绝大多数人，是不是？我希望同志们能团结大多数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我很欣赏李杨杨在发言中的一句话，她说：要真正站在群众之中，而不是站在群众之外，现在的任务不是成立贫协，而是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这是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

李雪峰同志讲话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作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束缚了群众的手足，五十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对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我们负不负责人？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当时的情况是，中央决定我来北京当书记，刚来就是批判斗争前市委，就是后来写的前市委的十大罪状。《红旗》第九期彻底地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我们破中求立，但遇到这种情况时，只有我和吴德同志两个“空军”司令，习惯势力就起了作用，立刻想到派工作组，到处求援，求各部，各地方。当然前市委还有一些工作组，但那些单位又要求派工作组，如一个外国语学院，原是前市委的工作组，要求派新的工作组，那几个同志给我们提的意见很好。对于你们那里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只有面向群众，我们有责任了解，我们有老框框，到处要人。当然外地的人我们一般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摆脱日常事务工作，到前线来犯了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群众来信很多，也处理不完，当然都处理也没那么容易。当时到市委来的，一天达到三千人，也包括学生，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原谅我们，官僚就是官僚，我们没有象江青、陈伯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五月廿五日的报告（按：五月廿五日聂元梓等同志贴出来第一张大字报，李雪峰当时到北大作了一个报告），五月廿五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六月三日，新市委宣布成立，六月四日那几天敲锣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六月四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六月廿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一个光杆司令。

关于“六·一八”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六·一八”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六月廿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二十三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六月一日后，到北大声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廿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七月十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场面，陈xx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么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北京是首都，要看北京工作如何，对支持越南也作了一个好的开端，检阅……，这是国庆演习，证明了北京人民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们不仅搞文化，也搞武化，大搞军事训练，当兵保卫首都，把北京搞成坚强的地区。



（据北大大字报整理）

~~~~~

## 【史海钩沉】

### 1969年的北京高干大疏散

• 莽东鸿 •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

从1969年3月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其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5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准备打仗。”15日，在中央碰头会上，他又说，大敌当前，我们是后发制人，并具体地说到对付苏联可能发动的战争问题。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和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说，党中央命令你们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粉碎美帝、苏修的武装挑衅，防止它们的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和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援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七二三布告”和“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中央对战备工作采取了“内紧外松”的方针。在当时的报刊和广播电台上，大都是些“活学活用”、“大批判”、“教育革命”、“五七干校”、“样板戏”、“农业学大寨”等方面的内容。“八二八命令”发布后，在一些报纸和广播电台上，一度出现过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但很快被中央制止。

实际上，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在京的中央大批党政机关，以及北京主要单位、学校，包括其家属，被紧急疏散到外地，有的暂时先疏散至郊区。文化部所属机关、学校、剧团和文联、作协去湖北咸宁，其他协会去沙城。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作协部分人员，分别于9月25日、26日动身。中科院原子能所去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部去河南息县。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全国物价委员会去湖北襄樊。10月25日，国防科委机关干部，全部去了河南遂平县莲环湖干校。11月15日中国作协机关宣布了紧急疏散命令，所有人都下去，11月30日和12月15日分两批疏散。

边境地区的军政机关，如黑龙江黑河地区的革委会、军分区也向内地迁移。吉林市计划将全市人口的三分之一下放至农村。

许多高校紧急迁出城市。北京大学的一部分疏散到汉中，一部分疏散到江西鄱阳湖畔。北

师大师生疏散到西郊东方红炼油厂。中国科技大学迁往合肥。中央广播学院迁到河北望都。中央民族学院迁到湖北潜江。北京农业大学先迁河北涿县，后迁到陕北甘泉。长春10所高校在一个多月期间，下放干部、教师4400人，占总数的58.6%。

离开牛棚不久的中国曲协副主席、作家陶钝这样回忆：“北京市内一片慌乱，一些外地有关系的住户都安排搬往外地。收售旧家具的店铺，以贱价收购了大量的家具。我把老家的人叫了来，把大衣橱、樟木箱子、书架，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集或选集都装箱运回乡下。旧家具价钱落到大立橱20元，写字桌10余元，一个弹簧单人床垫子才卖了12元。”作家陈白尘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在北京站登火车时，“秩序大乱，有如逃难的难民”。韦韬回忆说：北京疏散，“中心是要把北京的所有‘闲杂人员’、‘危险分子’统统疏送到内地去‘监护’；把业务已停专事斗批改的机关单位，统统迁往农村，或办‘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把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通知说：为了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应付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经中央讨论决定：中央机关集中到北京郊区战备地下指挥部办公，由周恩来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工作；毛泽东主席到武汉主持全国的大政方针，林彪副主席到苏州负责战备。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

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15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疏散工作做了具体安排。

16日至17日，疏散工作紧张进行。

17日，林彪离京飞抵苏州。

同日，黄永胜指示阎仲川组织前方指挥班子，进驻京西山区。军委办事组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随同进驻。

在北京留守的主要领导人只有周恩来和黄永胜几个人。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观众近2万人。其中被邀请观看的外宾约2000余人。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总理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徐向前和聂荣臻没有出席晚会，周恩来委托陈毅于次日上午在紫光阁专门做了传达。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是单独通知的。

10月15日，中办主任汪东兴派人把陶铸的妻子曾志找去，说：“北京要紧急疏散，可能要爆发战争，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自己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曾志回家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决定不让曾志去：“你千万不要陪我去，我活不了多久，你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祿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到开封。”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病卧在床上的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了：“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汪东兴带着王良恩到邓小平住处。汪东兴告诉邓小平，由于战备需要，中央决定将一些人疏散到外地，邓夫妇被安排到江西，去江西后还准备安排去工厂劳动锻炼。邓小平感到很突然。

张闻天和王稼祥是在宣布解除监护的同时，被分别通知疏散的。20日，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对已被监护一年半的张闻天夫妇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张闻天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故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启程。王良恩对王稼祥夫妇则说：“为了使你们得到更好的教育，决定你们三天之内动身到河南省信阳地区，接受工农兵再教育。信阳市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路途上有人护送，信阳那里已把你们的食宿安排好了。”王稼祥希望能晚些天走，把病治一下。回答是：“这是中央的决定，三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也不是你一个人。”

这些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因禁地。

这些被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徐向前回忆：“我是在10月18日接到‘疏散’紧急通知，限定20日离京去河南开封市。军人嘛，叫走就走，接到通知的第三天，我即带上一名随员和铺盖卷，按时离京了。”

聂荣臻回忆：“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悉，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刘伯承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向周恩来提出，如果真的要打仗，我愿意留在北京，给军委和总部当个参谋。如不行，就服从组织决定。

一些部级高干也被疏散：何长工去江西峡江，胡耀邦去河南潢川，谷牧去四川……住在北京海运仓招待所的宋任穷、黄火青、黄欧东、陈再道、钟汉华、秦基伟等人，也被紧急疏散。宋任穷去盘锦地区，陈再道、钟汉华去江西，秦基伟、李成芳等六人去湖南汉寿。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找我们这些人逐一个别谈话，宣布军委办事组的决定，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这几个人一走，楼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经交谈，得知我们被分得四面八方。昆明军区的我、李成芳、张子明、胡荣贵、张力雄和南京军区参谋长王蕴瑞这六个人被通知到广州军区。宣布的是命令，非走不可，一点商量的余地也不可能有。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

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在当事人看来，他们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徐海东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后，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24日，张闻天离京。

这些离京的老同志，一般是夫妻同行，也有单身的（如聂荣臻，他的妻子张瑞华已被下放到吉林省一所干校劳动；徐向前的妻子黄杰在纺织工业部受审查；陈云的妻子于若木已去中科院的湖南衡东干校）。经批准，有的带有少数亲属（如邓小平带了继母夏伯根，张闻天带了10岁的养女，王稼祥带了失去丈夫又自愿跟随公婆疏散的儿媳）。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刘少奇、陶铸自不必说。邓小平、张闻天、王稼祥一路都有专案组人员“陪同”。秦基伟等人也是如此。秦基伟后来回忆：“在火车上，我的卧铺对面是8341部队的一名排长，是专门监视我的。白天，他寸步不离我，晚上，我在床上动一下，他就要翻身起来看个究竟，可能整晚就没有合眼。后来我听说，在这批被勒令离京的高级干部中，有的甚至连与他同行的爱人也受到监视，在火车上去厕所不准关门，说是怕自杀。”

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平时他们只能在附近被划定的区域内活动，离开宾馆需要经过广州军区主管领导批准。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过了一段时间，她被允许到广州市内走走，采购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除此之外，每天无事可做。李富春的咳嗽越来越严重，经常牙痛，吃不好，睡不好。

在石家庄的陈毅，按照省革委会的安排，每周3个半天去铁路工厂参加活动。离开市区，要得到省革委会批准。他希望到附近农村看看，不被批准，只好呆在招待所里，同妻子张茜读书看报，阅读少量文件。

徐向前回忆：“到达开封一个星期，《开封日报》就登出‘二月逆流到了开封’的消息，我和随从人员，被市革委会安置在军分区的一个干休所里。接待原则被内定为‘不冷不热，偏重于冷’。”“我在开封，实际上过着半囚禁的生活。哪里也去不得，整天呆在房间里，看书看报。身边除工作人员外，没有一个亲人。……自己生活孤单，消息闭塞，心情更加郁闷，不知道‘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何年何月才能结束，也不知道其他老同志的命运如何。”

聂荣臻回忆：“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他对当地民兵建设提出了建议，并

对一些工厂农村进行了社会调查。聂仅有的一名秘书留在北京值班，邯郸军分区从机关挑选了一名干事给聂当秘书，同时向这位干事交待：生活上一定要照顾好；安全上绝对保证；不能介绍部队情况。

叶剑英、曾山在长沙住了一个多月以后，奉命迁住湘潭，但仍不让他们接触社会，也不让自由活动。两人提出：“我们到乡下看看，看看农村的大好形势，向贫下中农学习，搞点调查研究。”不予批准。叶剑英去了一趟广东看望子女，回来后，被责问：“去广东干什么？不让串连知道吗？”叶剑英后来还是利用各种机会，去过岳阳、湘潭等地。

陈云住在南昌市郊福州军区干休所，江西省委决定他在附近的化工厂“蹲点”。陈云每日上午去厂里参加活动。他还去了几个工厂考察。1971年7月至9月经中央批准回京办家事。1972年1月，参加了批判林彪的江西省委扩大会议。

1970年八九月间，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陈云等人参加了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省领导去看望过邓小平，工厂对邓的劳动、生活也很关照。一个多月以后，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汇报生活和工作情况，并说：“我们过得非常愉快。”邓小平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他们住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几间简陋的平房里，部队设岗“警卫”。规定他们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军分区机关放电影也要请示同意后才能看。有时可以在警卫人员的陪同下，到西江大堤散步。军分区保卫科每月还就张闻天的思想情况和言行，向上级作一次书面汇报。刘瑛回忆：“削职为民不算，还交付当地军分区‘看管’，简直就是‘发配’。”“从‘监护’到‘遣送’，我们只不过是从小黑屋换进了没有栅栏的‘鸟笼’。”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王稼祥住在离信阳五六里路远的一个大院里，围墙四周布置有警卫，在监视下生活，不准到工厂、田间同工农接近。朱仲丽回忆：“我们只住一栋房，院内的另一栋房子住着武装战士，由一个姓黄的管理员监管我们。”“那个管理员是一副野蛮的表情，卫兵监视我们一举一动。从北京的囚室放出来，这又是一种软禁。”

宋任穷、何长工、薛暮桥等人，多数在当地的五七干校或农场劳动。在开除刘少奇党籍的会议上没有举手的陈少敏，被遣送到河南罗山农场劳动改造。谷牧在四川江油和泯江的基建工程兵部队，当了半年兵，后转到江汉油田当了半年工人。陈再道、钟汉华被送到江西部队农场。

秦基伟等6人被送到湖南省汉寿县境内的一个部队农场——西湖农场监督劳动。他们6人被分到6个连队，规定相互间不准往来。秦基伟回忆：“我们几个人虽然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政治上却完全被打入了另册。我想订两份报纸，不行。写家信，寄出前要送上面审查。家里来信，到我手前也要审查，被认为不该写的一律抹去。每个周末的组织生活。我只能跟非党非团的战士们在一起，听值班班长训话。1970年的一天，选举四届人大的军队代表。连长对我说：老秦，你不用去了，回去看书吧。我当时心里又难受又气愤，心想，革命几

十年，反倒连个公民权都没有了。”

1970年至1973年间，大批被疏散外地的高干陆续返京。然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间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须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它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是在接到中央军委通知以后，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的。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邓小平曾多次写信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思想。1972年8月1日又呈信毛泽东，表示：“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1973年1月，中央通知邓小平近期返回北京。

谭震林在女儿转告了胡耀邦的话（“尽快给主席写信，作点检讨也无所谓了，提出回北京的要求”）之后，在1972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并很快恢复了他原来作为国家领导人的生活待遇。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

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

1969年11月12日和30日，刘少奇、陶铸在离京的第26天和第43天，分别因急性肺炎和癌症，死于囚禁地开封、合肥。徐海东夫妇住在郑州城郊的一个干部休养所。1970年2月，徐海东患了肺炎，接着发生心力衰竭，3月25日病逝。张闻天于1972年、1973年两次致信毛泽东并党中央，请求返回北京。1974年2月，张闻天在监管生活结束以后，又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是希望回京度晚年，二是希望中央能给以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机会。1975年4月，就迁居事，致函中组部，提出如上海不成，苏州或无锡也可以。6月9日接到通知：同意迁居无锡。8月张闻天迁居无锡。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

□ 原载《党史博览》2006年第1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